

我的父亲与《救国报》

□马金兰

我是丰南区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81岁了。我父亲马建廷(化名寒潮)生前曾任《救国报》总务科长,1944年牺牲于任上。牺牲时年仅28岁,现长眠于杨家铺烈士陵园。

近日看到《唐山劳动日报》连载的《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长文,我心潮起伏,不禁又想起父亲在《救国报》工作时的烽火岁月,以及英勇捐躯的悲壮往事。只是父亲牺牲那年,我只有八个月大。虽然后来从母亲的讲述中,大致了解到父亲在《救国报》工作时的忘我、牺牲时的英勇,但对他辗转日寇枪口下,奔走山区险路,一次次地转移阵地;多次冒险潜入敌占区采购物资,保证《救国报》的后勤供应,并多次掩护战友撤退;以及弹尽粮绝英勇不屈的壮丽情景,都无从具体知晓,我每每为此而伤怀。

后来,得悉陈大远同志曾是我父亲的战友,他们在《救国报》一起战斗过,共过患难。我有幸在北京和丰南两次与陈大远同志相见,从他的讲述中,才更详细地了解到父亲生前在《救国报》工作以及牺牲的情况。这以后,他寄给我一本天津日报新闻研究室编的《新闻史料》,上面刊有他写的回忆录《记冀东(救国报)的几位烈士》,文中记述了四位《救国报》烈士,我父亲寒潮就在其中。还有一期《冀东文艺》,刊有他写的《高飞吧,年轻的一代》,较详细记述了他与我父亲相识和共同战斗的往事,以及我父亲牺牲的经过。

在这里,我将其中一些段落摘录如下,谨以此作为对《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长文的回响,以及表达对我父亲那一辈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坚定信仰的崇高敬意。

陈大远在《忆冀东(救国报)的几位烈士》一文中写道:

寒潮同志,河北丰润人,原名马建廷,化名文生、宇辰,后改名寒潮。从1941年《救国报》社迁到鲁家峪时开始,他就是报社的总务科长。报社的后勤工作,像财务、总务、生活物资的供应、隐蔽地洞的建造,住地的踏看选择等等,都由他来担任。但是,他的最繁重的工作,最艰巨的任务,并不是这些,而是要保证报纸、书刊编辑出版所需要的物资供应,像纸张、油墨、蜡纸、卷写印刷用具等等,是一日不可或缺的。

这些物资,游击区根据地是没有的,必须从敌人据点里购买运送出来,比较小的据点如县城,也是很难买到的,要到大据点,主要是天津、唐山等城市才能得到这些物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寒潮同志物色了许多住在游击区同敌据点有关系的,并且通过这些人的同伙据点里有办法、有爱国心的人士相交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报社需要的物资买到手,运到根据地。这样的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不管敌人制造多少障碍,不管在敌人封锁、“扫荡”多么紧张的时刻,在寒潮同志的艰苦奋斗之下,《救国报》所需要的物资,从来没中断过,总是保证充足的供应。

陈大远在《高飞吧,年轻的一代》一文中写道:

1941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走进了遵化县鲁家峪东河沟的一个院落,这是我第一次踏进革命工作的门槛。接待我的是《救国报》社长崔林和寒潮同志。

我第一次踏进革命之门,在革命阵营里过第一个夜晚,就是同寒潮同志一起度过的。那一夜,我心情自然是不平静的,所以合不上眼,寒潮同志就陪我到能够合眼入睡的时候。

在这一夜里,我了解到,寒潮同志是丰润县小峪村人,自幼家境贫困,不得不到外边去当学徒、寻找职业,所以他并不是个地道的农民。他在镇上当过刻字工人,刻图章不仅要会操刀,而且还要会执笔,真草隶篆,都要写得清楚匀整。他还做过石印工人,不但能掌握石印技术,而且写一笔很好的蝇头小楷。因此,我惊叹他是个文武全才的人。他的工作,需要很好的脚力,今天在鲁家峪,明天可能到丰润城外,后天可能到唐山近郊,甚至要到天津附近的关系地,然后再到若干存放印刷物资的基地,妥善地把物资坚壁起来。他的一身好拳脚,武生式的身板,帮助了他的工作。他的文才,就使他十分热爱报纸的印刷出版事业。

第二天,崔林和寒潮同志,把我送到山东要儿峪,这儿有一个刻字小组,我就成了这个小组的成员。据说,寒潮同志经常到这儿来,以便了解卷写印刷物资的消耗情况。以后我们到鲁家峪以西的榛子峪、井儿峪一带活动,寒潮同志也经常在这里。不久之后,我们奉

命把工作、宿营地点定在鲁家峪北峪,寒潮同志也经常在这里办公。

我们发现寒潮同志有一个极大特点,需要的时候,总是不顾个人,经受疲劳,承担风险,去解除同志和乡亲们的困苦和危难。有的同志说:“寒潮同志是朋友两肋插刀。”他极其反对这种说法,总是正颜厉色的给予反驳:“谁看见我在肋巴骨上插着两把尖刀的?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绿林好汉。”寒潮同志越认真,就越有点像赛尔墩再世的气概,大家越爱同他开玩笑。

有些同志说,寒潮的腿,像水泔里的神行太保;他的心,像铸弹炉里的一团烈火,这团火不但炼着他自己,也炼着他在一起的别人,使他从朽铁变成一颗炸弹。

1944年初夏,青纱帐刚起。这时,寒潮同志为了从唐山运出一批印刷物资,同他的唯一助手张西庆同志,南下老庄子一带。

一天清晨,附近据点的敌人对寒潮同志住的村子实行包围、进攻,当他们发现这个突然情况的时候,敌人已经进院搜索,不可能突围转移了。摆在他们眼前的任务就是战斗。他们只有两个人,二把德枪,敌人几十倍于他们。他们研究了这种情况,决定一个人把住窗口,一个人把住门口,沉着应战,使有限的子弹,消灭更多的敌人。他们给敌人以足够的惩罚之后,英勇地牺牲在这里了。

关于他们战斗和牺牲的情况,只是后来听当地老乡说的。最了解情况的老乡也不是目击者,而是从现场,从敌人死亡情况,从寒潮和张西庆同志牺牲后的形态推断出来的。所以我不可能多置一句形容词。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悼念一位烈士是不用眼泪的,因为烈士最不喜欢眼泪。我同寒潮同志有些特殊关系,我第一天踏进革命之门,是他和崔林同志接待了我,我十分崇敬他的性格和品德,在危险的情况下,同他共同行动过两三次,而最重要的,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他和崔林同志把我引进到党内。因此,当我听说他牺牲的时候,偷偷地哭了一场,我哭他,也替他的父亲、爱人和孩子们哭他。因为这时候,他们还不可能知道寒潮同志牺牲的消息。我也曾为他作了一首挽诗,当时不敢给人看,现在不妨抄在这里。

革命途程远未终,奈何君死我偏生?

英雄常共崎岖路,偷问苍天泪雨零。

寒潮同志牺牲两年多之后,也就是日本投降后的不久,我到他家去了一趟,想给他的家属一些安慰。谁知这次见面的情况出我意料之外。寒潮同志的父亲向我说,要打仗就得有牺牲,怕牺牲还当石印工人不好?他死的硬气,没给中国人和我们马家丢脸就好。这话出自一个失掉儿子的老人,是多么可贵呀!他的爱人也说,告诉报社领导,不要惦记我们,建廷一死,可能给家里留下一点困难,可是我们会克服的。不是我来安慰他们,而是他们在安慰我。我的眼泪憋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1983和1984年,陈大远同志还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讲述了他老伴在战争年代曾到我家养伤等事,情感真切。在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你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同志。尤其是我和他有特殊的友谊,并不言过其实。当然,这不只是私人感情,主要的还是阶级感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北京有好几个同志都是你父亲的老战友。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要谈起你父亲和别的烈士的事情。你父亲在老同志们的心里是永远活着的。

你父亲的化名,第一次叫“文生”,1942年改为“宇辰”,1942年末改为“寒潮”(不是韩潮),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牺牲。这个名字基本上是他自起的,他原想叫“寒流”,后有政治部一位同志建议,“流”字不好,“潮”字更好,所以就叫作“寒潮”了。他在救国报社任总务科长,后来改为石印的印刷所长。因为你父亲有石印技术,还会刻图章。在工作上,他总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和同志的关系极好。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入党我不知道。但是我入党时你父亲是我的介绍人之一。

你父亲是个好同志、好党员,他的工作,他的牺牲,对共产党员的称号是毫无愧色的。我一想起你父亲,总是以有这样一位老战友而自豪。

……往事悠悠,并不如烟。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抗战烽火中这段可歌可泣的艰苦岁月,我们会永远铭记;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乃至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将永远鼓舞我们在新时代勇往直前。



乡野地气(二)

□于东兴

榜三遍

锄榜,是庄稼地里的主要活计。从禾苗出土到青纱帐起,大都要锄榜三遍,以除草、松土、保墒,防倒伏。榜三遍,也就成了昔日标志性农活。

高粱、谷子长到三四寸,玉米长到四五寸高时,下锄榜头遍,以锄松板结,刈除杂草。此时正值初夏,风清日朗,人们头顶草帽,脚踩垄背,下锄,回拉再前推,三步一回合,前进三五尺。拉锄,锄板不能吃土过深,也不能漂出地面。前推,下压锄板,推散翻上来的土坷垃。锄过的田垄,草净土新,禾苗规整,煞是好看。这时,视野开阔,时见锄地农人躬身忙碌于田野,锄地的沙沙声时隐时现。而张弛俯仰之间,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者,都是受尊敬的庄稼把式。

榜过头遍地,就要间苗(也叫薅苗)定苗了。高粱沟播,下种密,先间一次苗,长到四五寸高时再定苗。高粱定苗不再手薅,而是用锄板去铲。成手定苗,手头精准,举锄苗垄间,里勾外挑,按株距留下一株健苗,余下的碰到锄板就摇晃着喇喇倒下。成手留苗株距几乎一致,绝无疏密跳跃之处,令人叹为观止。玉米按掩播种,株距已定,每掩薅去多余,留下一株即可。薅苗的活计,多是妇女去做。蹲着薅苗,成垄成片,腿不得伸,腰不得直,一天下来,腰腿酸疼,也真难为了她们。

榜二遍时,禾苗已然覆垄,望远近瞧,绿色盈野。这时节,榜地又是一番功夫:先从外手下锄,培上外垄的土;再从里手深拔一锄,培上里垄的土;最后里接外撩两锄,一步四锄,培好三棵苗的土。榜过二遍,施过肥,再赶一场雨,小苗就窜着往上长。微风起处,绿叶飘摇,到了庄稼地里最好看的时候,也到了庄稼人最辛苦的时候。

高粱玉米长到一人高时,就要榜三遍了。这时,遍野庄稼已遮住视线,遮住村庄。钻进没人深的庄稼棵里,就像潜入密密的森林,非到近前,彼此都看不到对方,只听锄板前接后锄的“喳喳”声和庄稼叶子簌簌响。这次锄榜,要逐棵培上隆起的土堆,防止倒伏。此时天已入伏,正值“上蒸下煮”之时,庄稼地里密不透风,还未伸锄就先出汗了。榜到地头,抹把汗,若是正巧头顶飘过一朵云来,或是刮过一阵风,那是榜地人最惬意的时候了。

榜过三遍,庄稼进入旺盛的生长期。好像一夜之间,高粱就吐了穗,玉米就甩出花红线,田野里到处弥漫着青草和庄稼的气息……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23)

□王烁辉

(接上期)

3.《冀东日报》编采通全面发展 多路跟进唐山解放

1948年秋天,随着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摧枯拉朽,冀东解放指日可待,冀东区党委和冀东日报社为适应新的形势做了大量充足的准备工作。

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正在冀东十五专署公处从事锄奸反特工作的岳欣,收到冀东区委调他到冀东日报社任副社长的通知,并要求他尽快报到。第二天一早,连夜交接完工作的岳欣坐上一辆胶轮大车,向着遵化县西北的孟家铺出发。

孟家铺村位于长城脚下,远处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峦和郁郁葱葱的密林,冀东日报社此时正驻地办公。岳欣的到来受到了报社同志的热情欢迎,也加快了冀东区委对冀东日报社改组的步伐。

10月27日,报社召开全体大会,宣布了冀东日报社改组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情况:

社长仍由冀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张达兼任,岳欣任副社长实际主持报社工作。编辑部长是孔祥均,副部长是陈大远、陈棣;采通部长是白瑛。调走杨林,孟广平,还有一批原从各部门抽调来的同志也另有任用。

编辑部下所设的编辑、采通、机要、记者、资料、电台等各科、组、室的组织机构基本不变,但人员进行了调整。加强编辑部工作,实行编采通合一,加强地方消息报道,办好副刊。

综合几位老同志的笔记加以整理,报社此时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组成大致如下:

编辑科科长是陈大远,他还兼任副刊主编。编辑科下设新闻组和时事组:新闻组编发国内新闻;时事组负责编发电讯新闻,组长是万里,还有肖军(胡铮)、宋瑞祥、李远等几位同志。

采通科长是白瑛,采通科下设编整组、采通组:编整组负责编发地方新闻,整理通讯员来稿,组长是李玉文(于文);采通组负责采访和通讯员的联络工作,组长是王重

五,组员有金森、叶遥、金涛等人。

记者组组长是周新华,还有史向荣、鲁克等同志(记者组归采通科领导)。

资料室负责人是白坪(资料室归编辑科领导)。

机要科长是崔治平,还有毛真、李振等同志。

同时,为扩大稿件来源和使稿件有充分选择的余地,报社决定加强新华社冀东分社下属各支社的组织建设,并在各机关、学校和文教卫生部门聘请、发展一批特邀记者和通讯员。

扎实推进的一系列工作使《冀东日报》走上更加健康正常发展的轨道。

这一阶段,区委组织部还陆续分配给报社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其中多数是从北平、天津、唐山等地高等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一批从上海、重庆、浙江来的知识分子,如红谦、肖岭、丁方、陆明、杨达、洪涛、曾平、潮清、田兆祥、叶涛、洪滨等同志都是此时来到报社的。这批青年人的到来,不仅给报社注入了新鲜血液,也给报社的业余文化生活带来了十分活跃的气氛。这时的报社可说是人才济济,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冀东地区大战的气氛愈来愈浓,备战工作也越来越紧张。冀东日报社、新华社冀东分社指示各支社(即十四支社、十五支社、滦东支社、路南支社)加强解放城市的报道,并组织成前线支社,携带电台赶赴前线,随军报道。报社记者组长王重五任前线支社社长,他和史向荣、李远、叶遥等同志组成的前线记者组,报道我军战绩十分准确及时,为冀东各支社向总分社发稿争取了主动。

11月4日黎明,人们还没有起床。住在遵化县关山口村的冀东区委派人到孟家铺通知报社把房子腾出来,搬到遵化县魏进河村。原来我东北野战大军的一支先头部队在头一天深夜已经进关,指挥机关的同志们要在孟家铺设临时联络站。

部队来得太快了,快得出人意料,报社同志非常惊喜。大家马上起床收拾东西,把住房 and 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给部队腾好房子。然后高高兴兴地打起背包,向着

魏进河走去。

当天傍晚,报社所有人员全部搬到魏进河。这是个有百多户人家的村庄,老乡们热情地给腾了20来间房子,同志们办公、住宿挤在一起。紧张的工作,兴奋的情绪,热烈的议论,使报社生活空前活跃。

11月8日,滦东柳江长城煤矿和昌黎等县已解放,报社派周新华、刘保民同志前去采访。当天夜里,他们乘汽车出发,很快便发回了一系列令人激动的消息。

11月10日,寒风凛冽,下了一夜的大雪仍未停歇。天冷,路滑。冒雪出去采访的同志带来消息,东北解放军已有一批战斗部队顶风踏雪赶到冀东。

11月20日,报社刚从魏进河搬到郝各庄,唐山工委领导(已被任命唐山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杨远便到冀东日报社驻地,传达了中共冀东区委的决定:要求冀东日报社派出相关人员,在唐山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先期接收收伪唐山日报社的全部资产,并立即筹办中共唐山市委机关报《新唐山日报》。组织抽调新华社路南支社、路南《人民报》的赵振中、都珍和新华社十五支社社长白瑛负责《新唐山日报》工作。

报社第一时间开会研究了进入唐山后如何开展工作的事项,并制定了具体措施:一、立即派人赴唐山市外围房子,为报社机关、电台、印刷厂安排处所,待命就近入城;二、抓紧时间把印报的机器设备和电台通讯器材检验一遍,保证在唐山解放时按时出报和不误通讯联络;三、抓紧进城前的时间,把档案资料整理成册并编号并注明日期,装箱待运;四、把伪唐山市党、政、军、警、特、工矿企业、文教卫生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人事情况编成材料,供有关接收部门参考。

此后两天,大家都是在学习政策,分头阅读摘抄唐山政治、经济、文化、工矿、企业等材料中忙碌度过的。

在此期间,冀东区委筹组的进城机构与人员,包括中共唐山市委、唐山市政办处、唐山市公安局以及警备部队等已全部配齐,并先后出发到丰润县东北方向的曹鲍庄一带集中培训,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制定接

管方案等。

11月23日上午,报社进驻唐山的队伍(除记者组4人外,还有电台的3人,印刷厂10人,共17人),分乘两辆胶轮大车,欢天喜地向着曹鲍庄出发了。

刚下了一夜雨的道路泥泞不堪,方走50多里,已是夜雾弥漫,不得不夜宿遵化县六区崔庄子。24日黎明,由崔庄子启程赶路,经遵化县新店子、党峪、丰润县北夏庄、左家坞、杨家铺,车行60里,日落时分才赶到目的地曹鲍庄。

记者组一到曹鲍庄便开始紧张的学习和采访活动,他们分头到唐山市委、工委和部队的驻地采访,收集了解唐山各方面的情况,不断向《冀东日报》发来各种消息和通讯。报道了唐山人民喜迎解放的许多动人心弦的生动情景。

12月上旬,我东北解放军大部挥师入关,以排山倒海之势,分多路向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敌点进军,对敌进行分割包围,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防止其从海上逃跑。

王重五和叶遥一路追随着部队急行军。12月11日,他们在玉田亮甲店附近的一个小村同进关部队领导机关沟通后,便随着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一支开往唐山的部队同路前进。

这支由冀东子弟兵组成的铁血之师,作战骁勇,在辽沈战场立下赫赫战功,此次又作为第一批入关的野战部队,为家乡人民送来了胜利果实。

记者亲眼见证:在唐山近郊,敌人逃跑时在桥边埋布了地雷,解放军官兵在前面扫雷,开出一条狭窄的小路,大部队穿桥而过;在唐山市区,部队在零星的枪声中,快速追击敌人;在唐山火车站,大部分敌人已乘火车西逃,我主力部队继续向前挺进,追击逃跑之敌。

王重五和叶遥由火车站折回市内,根据部队领导机关发布的战况,向报社发回了唐山解放的消息,同时还报道了我军追击敌军并在唐山火车站俘获一批敌人缴获部分武器的消息。

冬夜的唐山市区,街上清静无人。率先进城的一部分同志立即组织起来收枪,将各

处散落的枪支收集后集中存放到开滦煤矿高级员工俱乐部。为了防备尚未逃跑或潜伏下来的敌人破坏,叶遥被派到高级员工俱乐部,看守了一夜枪支,王重五则又赶去参加接收收伪《唐山日报》。

史向荣和唐山市委机关一起行动。他的笔记录了唐山市委、市政办事处和各机关部门进入唐山市的情景:

1948年12月12日中午,曹鲍庄,唐山工委书记(已被任命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宋敏之紧急传达了最新命令,即唐山守敌已撤至唐山火车站,准备逃走。各部门即刻准备出发,必须于天亮前赶到唐山,接管城市。

同志们一片欢腾,紧急集合并于下午5点多钟整装出发,顺着通往丰润县城的公路,一路小跑前进。沿途经过的一些村庄,锣鼓、喇叭声响成一片,胜利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传各地。

到了丰润东关,只见灯笼火把照得通明,人们欢天喜地正在庆祝唐山解放。晚上,唐山市委机关人员在这里匆忙吃了饭,又连夜赶行四五十里,于13日凌晨进入唐山市。

早在日本投降之后,为准备接收唐山市,我党在原冀热辽区党委城工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唐山市委,归冀东区委党委领导,下辖唐北、唐西、唐东、东矿共4个工委。

1948年4月,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冀东区委党委决定,撤销唐山市委建制,改建为中共唐山工委。

1948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中共冀东区委以中共唐山工委为主要班底,组成了接管唐山市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任命阎达开为中共唐山市委书记,李一夫为唐山市政办处主任兼公安局局长,彭寿生为唐山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何兰阶为政治委员……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

1948年12月13日,唐山市军管会成立。

1948年12月14日,《新唐山日报》创刊。

1948年12月15日,中共唐山市委全面接管各项工作……

唐山,这座中国近代工业重镇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待续)